



亚太研究丛书

《新加坡》黄朝翰著

张乃坚 许衍敦 刘 勇译

中国与亚太地区 变化中的 政治经济关系



暨南大学出版社

CDO 23

●亚太研究丛书●

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 政治经济关系

〔新加坡〕黄朝翰 著

张乃坚 许衍敦 刘 勇 译



中财 B0033670

中央财经学院图书馆藏书

总号 332399

书号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广州

John 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The Mac Millan Press Ltd

1984

•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1988

**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
政治经济关系**

〔新加坡〕黄朝翰 著
张乃坚 许衍敦 刘 勇 译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封开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0千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7-81029-038-X/D·3

定价: 3.80

“亚太研究丛书”序

亚太地区地域广袤，拥有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力巨大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本地区的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相继崛起。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也正在创造条件，积极发展经济，力求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成为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亚太地区的发展态势，这一地区人民创造的经济奇迹，引人注目，令人惊叹。亚太地区正在崛起；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东移；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这已成为国际上政治界、经济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因而，亚太地区的各个方面，也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新焦点。

我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各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亚太地区的发展态势对我国关系重大，影响至巨。因此，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要求我们加强对亚太地区的研究，藉以了解我国周边的发展和变化。这对我国更好地介入这一地区的国际事务，更积极地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对于增进我国与这个地区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配合和推动亚太问题的研究，并使有关著述能够面世，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亚太研究丛书”，编辑出版中外学者有关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华侨、华人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每年出版若干本，长期出下去。为丰富丛书的内容，搞好丛书的出版工作，我们衷心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提供宝贵意见。

限于水平，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定有不完善之处，祈请海内外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陈 乔 之

1989年9月18日于暨南园

序 言

陈乔之

黄朝翰教授是新加坡知名华人学者，早年就读于香港，后负笈英国，在伦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嗣后，赴新加坡任职，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曾代理系主任工作。他还是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发展规划特别顾问及有关问题专家小组成员，对东盟经济、亚太经济以及中国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造诣颇深。已发表上百项有关上述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其中专著多种，《东盟经济剖析》一书，曾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翻译出版，在国内东南亚研究界获得好评。

现在出版的这本专著《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是由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张乃坚副教授等人负责翻译的。这本专著两年前由日本立命馆大学西口清胜副教授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反应良好。经黄教授补充一篇新作《中国加入亚太地区的一体化》之后，本书书名也在征得黄教授本人同意之后，改为现名。

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资料丰富，数据系统、翔实，阐发了作者一些独特的见解，对于从事中国与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相信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必将引起国内同行专家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并对促进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我们同黄朝翰教授之间业已存在的友谊，发挥应有的作用。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已联合出版“亚太研究丛书”，本书亦为该丛书之一。诚盼海外学者今后有此类著作，也能与我们联系，以便列入“亚太研究丛书”出版。

1990年9月24日

前 言

十年前尼克松总统对北京的访问为东南亚迎来了国际政治的新时代，特别是对于它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关系方面。尼克松之行加速了中国的开放，处于文化大革命余殃之中的中国也日益感到与东南亚各国在非意识形态基础上和平共处的必要。但尼克松北京之行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尤其惹人注目。紧跟着“尼克松冲击”，这些国家不得不顺应由于冷战趋向缓和而带来政治平衡的改变这一现实，并且寻求更为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手段，同它们那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运转的北方强邻中国相互交往。因而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当这个地区逐渐显露缓和迹象时，我就开始更改自己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兴趣，从原先关注它的国内经济问题变为关心它同东南亚的外部经济关系。我曾留意观察并以文件说明东南亚国家致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出现的许多令人兴奋的事件。回顾起来，正常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政治纠纷和波折，尤其是在初始阶段。同时，我的研究重点逐渐扩大到把东南亚经济问题包括在内，这就使我有可能是把“中国问题”同东南亚每个国家的特定政治和经济沿革联系起来。结果，这样的研究工作也许能表现一种颇为独特的特色。这是试图糅合“中国学识”和“东南亚学识”的办法，为中国—东南亚问题提供明确和平衡的剖析，以有别于中国专家用中国原始资料为依据的观点，也有别于东南亚专门家往往狭隘地采取的基于特定国家的立场。

本研究课题主要涉及中国同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关系中的经济方面。严格说来，由于双方在其他领域中的经济相互关系还未获得明显发展，这个研究主要侧重于东盟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为了对研究课题进行更加全面的叙述，这里采取了政治经济的探讨。国家之间的甚至对自由市场力量起作用的那些经济关系，很少局限于简单的货物和劳务交换。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经济关系的任何讨论不可能排除政治的主要作用。如果这部著作采用不费力的办法，根据已刊登的贸易统计数字去分析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和型式，然后在某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框架（比如说，经济福利的最大增进或其他基于交换贸易往来的方式）中引出结论，这将是极为平庸的，也不是现实的和狭隘的实践。

正如彼得·怀尔斯教授所强调的，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一种政治行动，经济学家不必为超越了所谓的“纯经济学”的界线而感到不安，因为“这条界线有如国际疆界一样，只是为了被无视而存在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冒犯国际关系的戒律，以便在工作中获取有关的原理。除了第一章以较为标准的方式完全忠实于中国同东盟经济关系总体型式的经济分析之外，其余五章则涉及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从事各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的探讨。在这五章里，我首先试图描绘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同每个东盟国家整个贸易的明朗图景，然后对照作为基础的政治事件或不管什么相关的体制力量所起的作用来分析其贸易型式和贸易行为。关于某些问题，我花费相当笔墨阐述其历史背景。我相信适当的历史剖析对于作出某些政策问题现状的评价可冒较小的风险，也同时提供一个密合的框架来检验其连贯性。持久地使人苦恼的现有中国—东盟关系中的许多棘手问题事实上起源于过去。中国—印尼外交僵局就是恰切的事例。不管如何令人信服的经济逻辑和政治论据，都不能充分解释当今印尼领导层不情愿和北京方面重新建立联系的原因。但历史因素却能够揭示这个问题的许

多真相。

要指出的是，本书的资料基本上来源于东南亚地区，而对中国官方数据的依赖程度极低。我也从一些地区性刊物，如《远东经济评论》中摘取资料。对地区研究有经验的人都会容易了解到，这种学术工作的基础研究，其艰巨任务不仅仅在于必须费力地从往往根本不同的当地资料来源中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而且还必须细致筛选和解释所整理的资料。众所周知，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地区处在冷战的影响之下，那时的某些当地资料具有严重偏见，并且充满政治性措词。因此，对这些资料进行过细的考察和作出中肯的解释是绝对必要的。

二

中国同东南亚有许多世纪相互交往的历史。而本书内容仅限于过去三十年的动乱岁月，这仅仅是它们年代久远的相互关系中的简短插曲。冷战的寿终正寝终于使它们的关系恢复到正常水平，双方都愿意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但不应把中国同东盟国家存在着全面关系的表面稳定视为理所当然。80年代的最后几年，它们未来关系的景况因仍存在相当众多不确定因素而模糊不清。中美关系的突然恶化或者中苏之间迅速恢复亲善，都足以使东盟同中国疏远。印度支那的形势可能是另一个不稳定参数。至于中国同各别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潜在的善变性极可能在东盟国家的内部发展中冒出。例如，在某个特定的东盟国家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复苏或者由于北京对华人问题的错误处理，都易于动摇中国和那个东盟国家的现有关系。毕竟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所有东盟国家都不是。这种最基本的差异，就算受到最轻微的刺激，也足以把双方抛回对抗关系的漩涡。

尽管按政治一层来说，中国—东盟关系，容易受损于不能预言的力量，但它们的经济关系则似乎面临着稳定的较良好的前

景。近年来中国同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获得稳步加强。此外，经济交往趋向于同过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牵连相分离，因此对不利的政治发展具有更大的反弹力。以中国—东盟贸易为例，由于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正在进一步发展，它们的双向贸易也将要稳步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双方贸易和经济增长都处于盘旋上升的过程。因此，在整个80年代，即使是中国—东盟之间的政治了解不会变得更深，也可以预见到中国—东盟经济关系逐步扩大的适度乐观的景象，这不是不现实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实质性增长，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将为更稳定的和更持久的政治关系创造“现实政治”的条件。

三

我对西德国民车辆厂基金会慨赠的研究补助表示感谢，它使我有机会游历东盟国家和香港以收集和更新本书所需的资料。早些时候，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会给我的几个直接同本书课题有关的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特此对这两个单位表示感谢。

〔新加坡〕黄朝翰

目 录

“亚太研究丛书”序.....	(1)
序.....陈乔之	(3)
前言.....	(1)
一 中国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变化中的限度	
历史背景.....	(1)
中国与东盟的比较剖析.....	(9)
中国—东盟贸易型式.....	(11)
中国推动经济现代化.....	(14)
互补的需求和竞争的供应之对比.....	(19)
中国贸易中的初级产品平衡.....	(19)
对制成品出口的竞争压力.....	(22)
二 印尼同中国的关系	
引言.....	(29)
早期关系.....	(32)
“议会民主”期间的关系.....	(34)
“有领导的民主”下的危机.....	(37)
北京雅—加达轴心.....	(41)

中国—印尼贸易的增长和结构·····	(44)
恢复正常关系的迟缓·····	(49)
外交僵局的逻辑·····	(56)

三 马来西亚／新加坡同中国的关系（之一）

引言·····	(60)
全马来亚同中国贸易的发展（1950—1966）·····	(64)
贸易的政治和经济·····	(70)
禁运·····	(71)
倾销·····	(73)
对抗·····	(79)
中国银行事件·····	(81)

四 马来西亚／新加坡同中国的关系（之二）

向关系正常化过渡·····	(85)
马来西亚·····	(86)
新加坡·····	(90)
贸易型式·····	(93)
增长和结构·····	(93)
贸易波动·····	(98)
中国对橡胶的需求·····	(101)
争论和问题·····	(105)

新加坡的作用·····	(110)
-------------	-------

五 菲律宾同中国的关系

引言·····	(114)
早期商业关系·····	(115)
冷战年代·····	(117)
走向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121)
中菲贸易·····	(130)
中菲关系的争论·····	(133)

六 泰国同中国的关系

引言·····	(139)
中泰关系的历史背景·····	(140)
早期贸易型式·····	(143)
不承认时期·····	(144)
互相敌对和回避·····	(150)
走向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152)
中泰贸易的型式和结构·····	(161)
争论和问题·····	(165)

附表·····	(169)
---------	-------

增篇 中国加入亚太经济一体化

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经济大国.....	(205)
一个不断增进一体化的有经济活力地区.....	(207)
中国向高速经济增长的过渡.....	(212)
中国同这一地区经济的相互作用.....	(217)
中国和日本.....	(219)
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220)
中国和东盟.....	(224)
结束语.....	(226)
附表.....	(228)



中国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 变化中的限度

历史背景

中国人传统上称东南亚为“南洋”。由于历史、地理和过去在这一带地区的移民，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范围广泛而且根深蒂固。中国同各别东南亚社会的早期接触可追溯到真正的古代，虽则按年代次序，中国经陆路同其南方周边国家的交往大大早于经海路的接触。到了宋朝（960—1280），中华帝国同许多东南亚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有如著名哈佛历史学家费正清所指出的，携带贡物的使团往往趁机“假进贡之名，行贸易之实”。费正清早就强调沿大陆海岸的中国海事活动的重要性。在“南洋”，甚至在15世纪时钦差正使太监郑和督董舟师几次出名的远征之前已有这种海事活动。确实，在16世纪，当欧洲冒险家和商人终于来到东南亚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商人早已在所有海港和主要贸易航路上进行活动。中国商人方面的许多商业活动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起源于传统的朝贡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华帝国用以进行与邻国交往的主要手段。

凭借其辽阔疆土、庞大人口和优越的文化体制，中国历来就给它的南方较为弱小邻国蒙上浓重的阴影。虽然中国的南方邻邦经常不安，有时还有一些疑惧，但它们并不当真把中华帝国看成

它们独立生存的真正威胁。对目前由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而不同中国接壤的东盟来说，尤其如此。确实，中华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向的大陆国家，几乎没有真正的热衷于海外领土的野心。除曾对其紧邻的安南和缅甸有过几次侵犯和侵袭外，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从未对“南洋”着手过南进来实现公然的领土扩张。朝贡制度只是一种外交手段，是在以儒家思想框架为基础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概念的支配下，用来寻求同非中国社会的国与国之间相处的关系。不应把“朝贡制度”一词按近代意义解释，视之作为一种依赖制度，认为中国谋求把它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权强加于较弱小的南方邻邦（尽管“朝贡”外交表面上是不平等的，但却不是这么一种国际关系制度，即必然对中国有利或者本来就对朝贡国抱有偏见），否则就会发生误解，就会把朝贡制度看作是中国同非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中国沙文主义的一种简单表现。

应该看到，现有的五个东盟国家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处于中国控制之下。除新加坡外，在受到中国文明主流影响（例如，以汉字为书写语言以及政府中的儒家制度，有如朝鲜和越南那样）的意义上，这些社会传统上都没有落入中国文化的领域。

在经济上，可以很简单地阐明中华帝国没有发起使其邻邦殖民化的原因。中国传统的经济一向就是自给的和基本上与国际经济活动隔绝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往往不具备足够的生产力来维持一个大规模的海外殖民事业，况且即使有所盈余，也经常因为要力撑防御以抵挡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而被消耗殆尽。中国历代王朝全神贯注北方安全问题，没有更多的精力，也没有更大的经济能力，用以支持所费不赀的海外扩张野心。这里未曾利用过经济刺激来从事这样的殖民事业。由于当时是工业前的经济结构，中华帝国并没有对“南洋”扩张的迫切需要。不象其后的欧洲殖民国家，既为了控制原料供应，也为它们的产品获取一个销售市场。事实上，中国的王朝由于儒家思想偏见而往往倾向于反对商

业活动。

因此，中国和“南洋”诸国的早期接触并没有导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公然统治。此外，中国同“南洋”的早期商业往来，虽然有时是活跃的，但基本上仍属小规模贸易，而且主要表现为没有组织的个人经营，同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所提高到的那种活动水平无法比拟。19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移民稳定地流入这一地区，中国同“南洋”的贸易开始有较快发展。从此，海外华人不仅在其东南亚东道国的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而且在影响这些国家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以后，中国同其南方邻国的关系呈现出新的限度，在这幅图景中加进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成分。中国不久开始采取一种一般性姿态，一些东盟国家将之理解为对它们安全的威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虽然这些国家可能了解过去中华帝国对这一地区没有政治谋划，但它们对新中国的反应却有所不同，新中国以强大的革命冲力为标记，具有改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因而它们对共产主义中国心存疑惧。

东盟心目中欠佳的中国形象的形成，部分原因是国际冷战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则在于对中国本身创造的革命辞句的误解。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推动下，特别是在60年代，北京开始在这一地区鼓吹革命。这自然要引起东盟各国政府方面的敌视和猜疑，北京对当地共产主义运动口口声声的支持特别令这些政府烦恼。所以东盟各国不是同美国结盟对中国进行“牵制”，就是避免同中国接触。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中国和东盟也互相疏远。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它的高度社会主义结构似乎与在东盟国家所运转的殖民地后经济和社会结构截然不同。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政治距离，也使得它们的意识形态差异更形尖锐。